

共产国际和中央红军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周 启 先

在中国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曾对我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前四次“围剿”都被我中央红军英勇地粉碎了,但第五次“围剿”却没有被粉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中国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抛弃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而推行了与之相反的错误的军事路线。

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包括红军的建军原则和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两个方面。建军原则主要是:红军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必须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这三项任务。战略战术原则主要是:在承认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充分利用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坚持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坚持实行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具体地讲就是:在敌人发动“围剿”之前,红军积极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在敌人“围剿”开始时,红军先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造成反攻的条件,然后转入反攻;在反攻时,实行歼灭战的指导方针,以运动战形式为主,辅之以游击战,在战役战斗中实行速决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内线作战不能打破“围剿”时,则转入外线作战。我中央苏区军民连续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就是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军事原

则的结果。

然而,李德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硬要抛弃毛泽东提出的军事原则,代之以他们的所谓“新原则”。在建军问题上,他们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强调不适当的正规化。在作战问题上,他们不承认敌强我弱,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否定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和集中兵力。

在第四次反“围剿”结束、第五次反“围剿”之前,他们不进行必要的军事休整,不做粉碎新的“围剿”的准备,而是不停顿地进攻。聂荣臻回忆说:3月21日,我们刚打完第四次反“围剿”中的草台岗战斗,“22日即奉命进攻乐安”^①。这就使我军得不到必要的休息,过分地消耗了体力,给第五次反“围剿”带来了不利因素。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面对强敌的进攻,他们不进行战略退却,却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苏区寸土”等口号,搞“全线出击”,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对此,毛泽东后来指出:“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②。

“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③但李德和“左”倾冒险主义者却不肯这样做。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了两个月后,即1933年11月发生了福建事变。毛泽东认为这是我军转入外线打破“围剿”的好机会,于是提出红军主力出击苏浙皖赣,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

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围剿”苏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以打破敌人“围剿”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的建议。但李德、博古等却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结果丧失了粉碎“围剿”的良机。蒋介石在摧垮福建人民政府之后，随即转过头来加紧围攻红军。

这时“左”倾冒险主义者和李德仍然不肯实行积极防御方针，而是处处设防，大力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广昌战役，李德、博古亲临指挥，强令红军打单纯的阵地战，在敌人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下，仍要死守阵地，进行“短促突击”，结果我军遭受重大损失，广昌又没有守住。

广昌失守之后，敌人分兵六路向中央根据地腹地推进，李德和“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六路分兵”、“节节抵御”、继续打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结果红军又遭重大伤亡，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又提出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之敌到湖南而消灭之、以扭转危局打破“围剿”的正确主张。可是，李德、博古等一意孤行，再次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样，打破“围剿”的最后希望就断绝了，中央红军只得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

对于李德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上述错误做法，共产国际曾几次来电提出了批评，同时指示他们要采取运动战。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即1933年10月，共产国际即致电中共中央：“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④在反“围剿”进行近半年之后的1934年2月，共产国际又致电中共中央指出：“我们的力量由于继续不断的变动，就不能积极参加作战。我们觉得应该在那些已经获得了某些胜利的地方击败敌人，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击败敌人。”“很明显，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⑤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无疑是正确的，如果李德、博古等认真研究执行，第五次反“围剿”的局面是会有所不同的。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

上述情况说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其军事方面的错误来讲，直接责任在李德和中国的“左”倾冒险主义者身上，而不在共产国际。但是，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是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党在军事方面进行具体指导的，所以他的错误又与共产国际有关，共产国际对此也有一定的责任。

二

就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军事方面的错误来讲，共产国际没有直接的责任，但是，全面地看，共产国际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除李德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军事路线方面犯了严重错误这个原因外，还有他们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而这两个方面的错误是与共产国际有密切关系的。同时，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服从政治路线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方面的错误，往往是由政治路线方面的错误带来的。就政治路线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对当时世界形势和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上，共产国际是有严重的失误。这种失误对于中共中央制定错误的反第五次“围剿”的方针策略有重大影响。

共产国际从“六大”开始，对世界形势和中国革命形势一直作了“左”的估计。1932年8、9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的决议指出：“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已经终结。……目前，正在向各阶级之间和各国之间发生巨大冲突的新时期过渡”。“在中国，已出现革命的形势。”⑥很明显，这种估计是脱离当时世界和中国的实际的。但是，王明“左”倾中央却对此完全加以肯定，并作为推行进攻路线的根据。

1933年7月，他们作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说：“最近一时期的许多事实，确切的证明了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的估计之完全正确。我们正处在中国革命与战争的中间，革命形势的开展正走到了一个急剧的转变关头。”⑦在第五次反“围剿”中（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则进一步指出：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关于目前世界形势的估计是个有历史意义的基本结论，五中全会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论断完全正确，“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⑧从这种“左”的估计出发，决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阻止中国走向殖民地道路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⑨正因如此，所以“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提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争取苏维埃

在全中国的胜利”等“左”的口号，制定出“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主义的策略。这正如彭德怀所说：“军事路线是服从政治路线的，政治上提出两条道路决战，不放弃苏维埃一寸土地，这就必然要产生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的单纯军事防御路线。”^⑩

第二、在阶级关系和革命任务问题上，共产国际也有严重失误，这种失误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也是有直接关系。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一直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尤其强调反对富农，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要求实行“下层统一战线”策略。“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日益成为主要敌人，抗日救亡运动成了国内主要革命运动。1927年曾附和了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民族资产阶级，这时也开始改变其政治态度，表示支持群众的抵制日货运动，要求对日“经济绝交”。国民党及其军队中也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有的不愿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日，有的拒不进攻苏区而起义加入红军。但是，共产国际却看不清这种变化，仍然抱着原来的观点不放，把国民党看做铁板一块，坚持认为推翻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⑪，继续强调在反帝斗争中应“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级和阶层的抗日民主要求，把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因此，它对第五次反“围剿”时发生的福建事变也就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福建方面有形成新阵线反对中央苏区的危险，指示中国党发表宣言，揭露蒋光鼐、蔡廷锴的反动本质，号召士兵到红军方面来^⑫，也就是“要兵不要官”。李德则更是说，蔡廷锴的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⑬。

正是在共产国际上述观点的影响下，中国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⑭。同时，反复强调要“经过下层统一战线”去开展反帝斗争。对待福建人民政府，虽然与它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但在军事上却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给它以应有的援助。结果福建人民政府垮台了，我们也坐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就组织路线而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方面的错误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

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也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是在共产国际大力支持下通过搞宗派活动上台的，上台后又是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推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共产国际在纠正立三路线时，就在组织上表现出了宗派主义的情绪，即怀疑中国党的老干部不忠于共产国际。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党，使中国党成为一个绝对忠于共产国际的党，共产国际便通过米夫等人极力支持王明等人大搞宗派活动，以夺取中国党的领导权。就是在米夫的怂恿和支持下，王明在中山大学大搞宗派活动，组织了一个宗派小集团。之后，共产国际和米夫又支持王明宗派集团在莫斯科和回国进行了一系列宗派夺权活动。1930年11月，米夫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亲自出马，直接参与和策划王明集团的夺权活动。米夫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秘密准备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草四中全会决议。四中全会在米夫的操纵下于1931年1月召开。王明集团主要成员通过四中全会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并成了政治局委员。自此，中央大权实际上操在他们手里。

四中全会实现了共产国际的意愿，因而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高度赞扬。共产国际说它“使中共在继续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上向前进了一大步，它纠正了政治路线和刷新了党的领导，同时开始了党全部工作中的转变”。^⑮这实际上就是批准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对当时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的“左”的估计出发，从“六大”开始就一直认为右倾是中国党内的主要危险，要求中国党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作为党内斗争的主要任务。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则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指示，在中国党内“集中火力反右倾”，并借此大力推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他们对怀疑、不同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其错误路线的同志，一律给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他们大批地撤换和排挤不愿盲从和随声附和的有经验的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而重用和提拔同他们气味相投、只知盲从和随声附和的缺乏经验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

毛泽东坚决反对他们的错误路线，他们便把毛泽东作为打击的最大对象。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把毛泽东的正确主

张诬蔑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对毛泽东进行“无情打击”，先后撤销毛泽东在党和红军内的职务，完全取消了他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由于没有贯彻他们的错误路线而执行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因而被说成所谓“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也遭到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是，对同他们气味相投，意见相合的人则相反。李德由于同他们的军事路线相合，他们就同李德配合得非常密切，以至把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李德。李德在他们的支持下则独断专行，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太上皇”。

总之，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在它的决议和指示的影响下，极力推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排挤以至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而让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以其军事教条主义的个人领导取代中央军委的集体领导，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可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政治、军事

和组织上推行错误路线的必然结果。因此，他们要负主要责任。但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所犯的这些错误都与共产国际有关，所以共产国际也负有重要责任。

注释：

① 《聂荣臻回忆录》，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集，第6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②③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204、219页。

④⑤ 《六大以来》（上），第671页。

⑥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獻资料》第2辑，第183—184页。

⑦⑧⑨⑭ 《六大以来》（上），第404、510—513、517、198页。

⑩ 《彭德怀自述》，第192页。

⑪⑫⑮ 杨云若编：《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第104、109—110、103页。

⑬ 《伍修权回忆录》（之一），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第17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上接第127页）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个人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他只有在与社会整体的和谐一致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完善发展。

最后，两位学者就教育，生态平衡和和平三个方面对东方思想的精华做了简要的总结。

教育。在亚氏那里，主张教育是一种普遍的经验，应该使受教育者达到最终的概念，认识宇宙，认识他自己。他把所有的学习和研究都归结为哲学的研究，以求达到一种整体的学习、教育。随着历史的发展，在西方，这种教育方式逐渐被分门别类的部门、职业性的教育所代替。相反，亚氏的主张却是东方的教育方式的写照。东方的教育强调人类对于整体性的追赶，以求达到整体性的人格。这是值得西方人借鉴的。

生态平衡。西方思想从亚氏开始，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是宇宙的主宰，表现在行动上，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忽视了自然的神圣性，污染空气，滥用资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东方思想强调人是宇宙的一部分、追求人与宇宙的和谐统一。这种整体思想有助于西方人生态平衡观念的巩固和发展。

和平。亚氏把和平定义为平静的秩序。在西方思想和西方社会中，着重强调的是秩序，而忽略了平静。和平是需要以极大的努力来争取并保持的。我们西方人总是到外在世界去寻求和平，而忽视了到内心去寻求平静。佛教徒通过对佛的沉思冥想，而产生对和平的追求。不仅佛教这样，整个东方思想都具有这一特色。这种对人内心平静的追求也是值得西方人思考、学习的。

注：

这个综述是根据讲演的录音整理而成，讲演者是即兴而讲，无讲稿可核对，发表时也未经讲演者核准，错误之处请读者指出。至于观点，则是根据录音，未加修改。